

建 本 论 略

杨 起 予

刻本，若以刻梓者来说，一般可分为官刻、家刻与坊刻三大类型。勘之自宋至清的刻本，在数量上，坊刻压倒官刻和家刻。

论坊刻，历经宋、元、明三代，福建始终是全国的中心之一，其书坊遍布全省各地。从刻书历史、技术、经验、数量、质量、销路，以及在社会上所产生的影响来考察，建阳，是福建坊刻的中心。本文所说的“建本”，即指福建建阳书坊刻本。为了便于说明问题，现围绕如下几个问题对建本进行一次初步探讨。

一、福建坊刻地区分布概述

福建刻书主要地区，东有福州，南有莆田、泉州，西有长汀，北有建阳。

福州，乃福建省会，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刻书事业比较发达。由福州东禅寺等觉院住持冲真等人发起募缘刊刻的佛藏——《福州东禅寺大藏》，或称《崇宁大藏》、《崇宁万寿大藏》，开雕于北宋元丰三年，藏事于崇宁二年（1080～1103），历时二十三年。全藏凡五百九十五函，六千四百三十四卷。仅仅相隔十年，福州开元寺又于政和二年（1112）绣梓《毗卢大藏》，于南宋乾道八年（1172）完成，或说报竣于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也耗费了四十个寒暑。全藏凡五百六十四函，六千一

百一十七卷。两佛藏雕印的圆满成功，显示了福州刻书事业的发达。福州还于政和六年（1116）或七年（1117）鸠工镂版我国第一部木版雕印的道藏——《政和万寿道藏》于闽县的万寿观。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刻印了宋刻四部佛藏中的两部，和唯一的一部宋刻道藏，刻书事业是相当繁盛的。

自两宋以后，福州书坊林立，经久不衰。北宋元祐年间（1086~1094）刻梓的《鼓山大藏》，绍圣三年（1096）福州东禅寺等觉院刊刻的《中阿含经》，南宋淳熙三年（1176）阮仲猷种德堂刻印的《春秋经传集解》，淳祐十年（1250）福建路提举使季温锱梓的《国朝诸臣奏议》，以及北宋刻递修本《汉书注》，元至正二十六至二十八年（1289~1291）魏天祐刻本《资治通鉴》，明正德刻本《福州府志》，清吴玉田书坊刻本《巴黎茶花女遗事》，等等，都是流传至今的福州官刻、家刻与坊刻之佼佼者，多数在当时就被称为善本了。

莆田，早在宋初就是全省刻书中心之一。其后各代，更有所发展。清光绪年间，又采用石印、铅印等新的印刷技术，刻书事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到了辛亥革命以后，仅仅一个濒海县城，就拥有六个规模较大的书局。所刻之书，多系地方文献。流传至今，或见于著录的有：南宋乾道四年（1168）兴化军学教授蒋邕刻本《蔡忠惠集》，庆元五年（1199）莆田黄汝嘉刻本《春秋传》，宝庆三年（1227）莆田教官陈森刻本《崇古文诀》，淳祐九年（1249）莆田郡斋刻本《后村居士集》，以及明正德年间重刻本《艾轩集》，万历四十三年（1616）兴化知府蔡善继刻本《宋端明殿学士蔡忠惠公文集》，万历年间黄启龙重刻本《莆阳文献》，天启年间黄廷用刻本《莆阳知稼翁集》，等等。这些刻本多系珍、善本。

泉州刻书的主要发祥地，是田庵、淮口、后坂等村。相传是从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前后朱熹到泉州讲学时开始的。著

名书坊有：辅仁堂、绮文堂、郁文堂、聚德堂、崇经堂等。以宋本为例，有传本或著录可据的有：乾道二年（1166）韩仲通刻本《孔氏六帖》；淳熙八年（1181）泉州府学刻本《禹贡论》；淳熙九年（1182）泉州郡庠刻本《潜虚》附《潜虚发微》、中和堂刻本《读史管见》；淳熙十年（1183）泉州公使库印书局刻本《司马太师温国文正公传家集》；端平元年（1234）泉州府学刻本《心经》，以及泉州郡斋刻本《梁溪先生集》等。特别应当提到的是，泉州府学刻本《禹贡论》，它不仅“纸墨精莹”，“光彩照人”，而且可以据此诂正《通志堂经解》本的脱误，不愧为宋本中的杰作。

长汀刻书，亦发端于宋代。清杨澜《临汀汇考》曾对长汀刻书作过这样的描述：“长汀四堡乡皆以书籍为业。家有藏版，岁一刷印，贩行远近。虽未及建安之盛行，而经生应用之典籍及课艺应试之文一一皆备。城市有店，乡以肩挑。不但便于艺林，抑且家为恒产……。”南宋乾道三年（1167）临汀郡庠刻本《嵩山文集》，庆元三年（1197）临汀郡斋的《使辽语录》和《古灵先生文集》等，都是现存宋刻汀本。在现存宋刻汀本中，《九章算经》、《周髀算经》、《孙子算经》等，都曾被明末毛晋据以影抄汲古阁影宋抄本。这充分证明杨说之不诬。

二、建阳刻书及其兴替

建阳刻书，以麻沙、崇化二镇为最，号称“图书之府”。据清叶德辉的《书林清话》（以下简称《清话》），建阳刻书历史最为悠久。早在唐代，这里就是书坊林立的地方。南宋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就已提到了建本，在当时与成都、杭州形成了全国三大刻书中心。元代，成都趋于衰微，杭州虽未动摇其刻书中心的地位，但多数坊本都来自建阳，而且建本行销国内外。入明，仍与杭州、北京、金陵形成全国四大刻书中心。后来，两次

大火灾使它元气大伤，才衰落了下來。到了清朝，再也无力跻身于全国刻书中心的行列了。

自宋洎明，建阳余氏万卷堂、江氏群玉堂、王氏世翰堂、刘氏三桂堂等是促进持续繁荣的骨干力量。在这支骨干力量中，以余氏书坊为最。《清话·宋建安余氏刻书》中有“夫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安为最，建安尤以余氏为最”的论断。余氏书坊自宋初以迄于清初持续了好几百年，可以说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实力雄厚。所刻之书，经、史、子、集无所不涉，而且数量多、质量高。除宋《古列女传》、元《千家注杜诗》和《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所载《仪礼图》外，还有叶氏开列的余刻书目，并肯定余氏刻书为当时所推重。

余氏刻书从什么时候开始呢？这个问题，《建阳余氏族谱》作了明确的解答：南北朝梁大通二年（528），余青为建阳令。为避侯景之乱，把家安在闽中。传至第十四世，迁居建阳，改业刻书。这与叶氏所说的“乃南北朝余祖焕始居闽中。十四世徙建安书林，习其业”是吻合的。

建阳刻书兴旺发达了好几百年，究其原因，大概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从地理位置和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各方面看来，中原地区肯定优越于建阳。但是，清代以前，中原地区战乱频仍，优势发挥不出来，而建阳未受战火波及，处于相对安定的状态。政治上的相对安定，使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经济与文化因而有可能出现相对繁荣、发达的景象。这就给刻书事业的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

（二）宋元两代，特别是两宋时期，建阳曾是杨亿、柳永、杨时、李纲、胡宏、袁枢、蔡元定、真德秀、刘克庄、严羽、黄公绍、熊忠、黄镇成等名流学者涉足之地。他们的一系列文化学术活动，对建阳文化与刻书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特

别需要指出的是，宋代的刘子翬、朱熹师生先后讲学建阳，对浓厚建阳学术气氛，普及和提高建阳文化，发展建阳刻书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代的廖刚、刘坪，元代的祝穆、熊禾，明代的熊大木、余象斗等都参与过编校工作，对建阳刻书事业更产生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三）早在宋代，建阳书坊就已拥有相当雄厚的编辑、出版力量。以刘氏三桂堂为例，从《麻沙刘氏族谱》获悉，仅这么一家就拥有编校人员一十四人，印刷、装订人员一十六人。余氏书坊，实力尤过之。还有江氏、王氏等许多书坊，实力雄厚，相互竞争，使建阳书坊能够争相快出书、多出书、出好书，从而有条件与成都、杭州形成鼎足之势。到了元代，更是独霸天下。直至明代，仍不失为全国刻书中心之一。

（四）地方政府官员和政府各机构重视刻书事业。北宋蔡襄曾刻《荔支谱》和《茶录》，南宋梁克家也曾纂修并开雕过《三山志》。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建安漕司刻梓《东观余论》，淳熙二年（1175）建安郡斋韩元吉梓行《大戴礼记》，宝庆二年（1226）建安郡斋叶时刻印《类说》，咸淳元年（1265）建安书院钜梓《晦庵集》，等等，都能起倡导的作用。

地方官员对刻书的重视，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多数官刻，都交由书坊雕造。《清话》在介绍建安余氏刻书时，曾肯定地指出，宋时官刻多由余氏刊行。这一风气，代代相传，几乎已成定制。据《嘉靖建阳县志》，明正德年间，建阳知县区玉就曾吁请府县官吏捐俸资助慎独斋主人刘洪开造官刻本《山堂考索》。二是亲自主持刻书。明正德六年（1511）孙佐、嘉靖十七年（1538）李东光、嘉靖二十三年（1553）冯续科、嘉靖三十六年（1557）顾名儒、嘉靖四十年（1561）前后邹可张、万历三十八年（1610）叶大受、崇祯十五年（1642）黄国琦等建阳父母官们都曾分别刻有《唐文鉴》、《建宁人物传》、《说理会编》、

《孙尚书内简尺牍编注》、《新编古今事文类聚》、《痰火颞门》，以及《册府元龟》等，在社会上，特别是建阳书坊中，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三是直接参与书坊的编校。明宣德年间，知县张光启，曾与崇化书坊主人刘剡共同辑校过《资治通鉴节要续编》。正德年间，知县邵幽，也曾为刘洪慎独斋校订过《文献通考》。这不仅是一种关心和支持，而且也是一种检查和督促。

在地方官员和地方政府各机构对坊刻的重视、倡导、支持和参与的同时，当地私家刻书也非常活跃。南宋庆元元年（1195）黄善夫家塾刻有《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庆元二年（1196）陈彦甫家塾刻有《圣宋名贤四六丛珠》，以及黄善夫家塾的《后汉书》，曾氏家塾的《文场资用分门近思录》，魏仲举宅的《新唐书》，等等。家刻与官刻的相互促进，又有助于坊刻的蓬勃发展。

（五）与省内外同行展开持久性的、全方位的竞争，也是建阳书坊刻书事业欣欣向荣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本省，各主要刻书地区，无论刻书的数量还是质量都相当可观，都有竞争能力。建阳书坊如不自强不息，随时都可能被抛在后头。特别是人才所萃，财物所钟，信息灵通，销售方便之地——福州，有很多刻书条件都优于建阳。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福州顺利地完竣三部规模宏大的佛藏、道藏的刻印任务，而且第一次通过募缘集资方式打破了官刻佛藏的惯例，大胆地革新了装帧形制，首创了经折装。这一切，都从人力、财力、物力、技术、经验诸方面显示了福州刻书的高水平。这不能不使建阳书坊受到鼓舞与鞭策。

在省外，于两宋，得与成都、杭州争高下；于元代，得与杭州决雌雄；于朱明，得与京、宁、杭相抗衡。明时北京、金陵书坊的崛起，都给建阳坊刻的生存与发展造成直接威胁。要生存，要发展，就不能不去奋发图强。

(六) 建阳紧邻建宁府治，政治、经济、文化条件都比较优越。而地处闽、浙、赣三省交通要道，又有利于与外省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加上农副产品比较丰富，开展贸易的基础也比较雄厚。这些客观条件，必然使它成为一个省内外商贾云集的贸易中心。集市贸易的活跃，带来了书市的繁荣。建本，始终成了集市贸易中的畅销物资。清王士禛《敬业堂集》卷四四《建溪棹歌》“江西估客建阳来，不载兰花与药材。点缀溪山真不俗，麻沙村里贩书回”足以证明。这就大大地激发了建阳书坊刻书的积极性。

(七) 建阳地处闽北山区，盛产竹木，给造纸与制作版片提供了资源。从而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工效，缩短了出版发行的周期。

但至明末清初，建阳刻书日益不景气，其原因：首先，在这一历史时期，福建几乎烽烟不断，民生凋敝，打破了以往政治上相对安定、经济上相对繁荣、文化上相对发达的局面，使建阳刻书顿失赖以生存与发展的起码条件。这给建阳刻书以极大的冲击。其次，在此期间，再也找不到像蔡襄、梁克家那样带头的刻书者，再也找不到像刘子翬、朱熹那样的文化学术的传播者，再也找不到像邵雍、张光启那样检查、督促刻书的官员、再也找不到像廖刚、刘珔、祝穆、熊禾、熊大木、余象斗那样直接参与撰著、编校的学者了。一句话，缺乏一批直接间接地推动刻书事业发展的积极支持者。再次，即明末的一次大火，使其资金、设备、原料、材料、资料、底本、版片、成品、半成品，连同工棚、店面，顷刻之间化为灰烬，损失惨重。尤其严重的是，书坊主人们从精神上垮了下来，终于导致了我国坊刻百花园地里这枝占尽风情好几百年的奇葩枯萎了下来。

三、建本刻风及其演变

木版雕印的典籍，由于制版工艺和装帧形制的基本相同，

从外形到行款、版式，都恍如一副面孔。然而，由于时代和地区的条件、追求与习惯不尽相同，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同一时代的不同地区，同一地区的不同时代，都必然在刻本上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差异来，绝不可能千篇一律。就以上版字体而论，宋初，多用瘦劲、俊秀、字形稍长、转笔清细有角的欧体。后来，逐渐流行雄浑朴厚、间架开阔、笔画丰满的颜体。到了南宋，转而采用字画清瘦挺拔、起落顿笔、过笔略细的柳体。从不同刻书地区来看，其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大体上是：浙本一般多用欧体，蜀本常用颜体，而建本则多半颜、柳兼用，尤其偏重疏朗秀劲的瘦金体。

考察建本刻风，至少有如下四个特点：黑口，双边，双鱼尾，多刻有牌记。

元刻本中，天历三年（1330）广勤书堂刻本《新刊王氏脉经》，至顺元年（1330）郑氏文宗堂刻本《静修先生文集》，元统三年（1335）余志安勤有书堂刻本《国朝名臣事略》，后至元六年（1340）郑氏积诚堂刻本《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和刘氏日新堂刻本《伯生诗续集》，至正元年（1341）虞氏务本堂刻本《赵子昂诗集》等，都具备上述特点。

建本，也跟其他地区的坊刻一样，有它自己的“沿革”。上述特点，可以说就是建本在“沿”的方面的具体表现。它自宋至明，一竿子插到底，形成了建本的“主旋律”。没有这“主旋律”，就不存在建本的刻风。

建本在“革”的方面可以从边栏、象鼻、鱼尾来考察。

（一）宋元刻本多双边，而且都是从左右双边转为四周双边；明刻四周双边或四周单边。

（二）宋初白口；宋及元黑口，而且都是由细黑口转为粗黑口；明刻或黑口，或白口；万历及其以后为白口。

（三）宋刻，顺鱼尾，对鱼尾兼有；元刻顺鱼尾，篇名多冠

以花鱼尾；明万历及其以后，或双鱼尾，或单鱼尾。

再看余氏刻书，宋刻一般为十一行，黑口，左右双边；元刻一般为十二行，黑口，左右双边；明刻一般为十行，其次是九行或十一行，白口，四周单边。这表明：革，并非突变，而是在“沿”的基础上潜在地、缓慢地进行着的。沿，孕育着“革”；革，寓于“沿”中。沿与“革”是犬牙交错着的。这就必须通过全面而又系统的考察，深入细致的分析和比较，掌握其来龙去脉。只有这样，才能较为准确地把握住版本的时代风格与地区特点，并把它运用于古籍版本鉴定。另外，从余氏书坊的刻风与各个相应时代的建本极为相似这一点，可以看出建本的刻风及其演变，无形中是由许许多多像余氏那样的书坊刻书特点所约定俗成的。反之，余氏等许许多多坊书的刻本，无一不受建本整体刻风及其演变的支配与影响的。

四、建本与其他坊本的比较

古籍版本鉴定，也要通过比较去发现版本的真赝、异同与优劣。辨别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坊本的刻风及其沿革，是古籍版本鉴定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比较法在古籍版本鉴定中的具体运用之一。

在宋代，全国仅有三大刻书中心。因此，比较自应在建本与蜀本、浙本之间进行。

（一）建本初期是白口，后来转为细黑口，再变而为粗黑口；蜀本、浙本皆白口。

（二）建本由初期的左右双边转为四周双边；蜀本、浙本均为左右双边。

（三）建本双鱼尾；蜀本、浙本单鱼尾。

（四）建本部分有书耳，蜀本、浙本一般没书耳。

（五）建本多有牌记；蜀本、浙本一般不刻牌记。

(六) 建本多用黄麻纸；蜀本多用白麻纸，浙本白、黄麻纸兼用。

(七) 建本多用颜体、柳体字，尤其偏重瘦金体；蜀本颜体，浙本欧体。

(八) 建本避讳不严；蜀本避讳较严，浙本避讳更严。

从比较可以看出，建本与蜀本、浙本在风格上悬殊很大，不难辨认。蜀本与浙本倒很近似，但从字体、纸墨等方面进行比较，也是不难鉴别的。

元代书坊刻书，著名的只有建阳与杭州。现仅就版式、牌记、纸墨、字体等方面与浙本作一比较：

- (一) 建本黑口，浙本多白口；
- (二) 建本双鱼尾，浙本单尾或双尾；
- (三) 建本部分有书耳，浙本个别有书耳；
- (四) 建本有牌记，浙本个别有牌记；
- (五) 建本多黄麻纸及竹纸，浙本白、黄麻纸兼用；
- (六) 建本字多介于柳、赵之间，浙本则欧体参以柳体。

通过比较表明，元刻建本与浙本迥异殊甚，较易识别。

到了明代，北京、金陵书坊相继崛起，与建阳、杭州形成全国四大刻书中心。在这里，不妨进行一些抽样比较。

建本，余氏勤有堂、刘氏翠岩精舍、朱氏尊德书堂、刘氏安正堂、詹氏进德书堂、杨氏清江书堂、刘氏慎独斋等部分刻本的共同特点是：万历以前多每半叶十二行，黑口，四双，双尾，多刻牌记，几乎与元刻一脉相承。

杭州刻书，容与堂名最著。从其《李卓吾先生批评幽闺记》、《李卓吾先生批评琵琶记》、《李卓吾先生批评红拂记》，以及《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等有限传本看来，多每半叶十行，白口，单边，线鱼尾，多插图。

金陵书坊，著名的有唐锦池的文林阁、唐振吾的广庆堂、唐

氏世德堂，和陈大来的继志斋，等等。其共同特点是：多刻戏曲；多在封面、目后或题下刻有刻梓者姓名或堂室名；书名多刻“新刻”、“新刻出像”、“新刻全相”，以及“重校”等冠词。

此外，文林阁、世德堂所刻多两节版。

唐对溪的富春堂尤为著名，其刻本特点与上述各家颇有相似之处。多刻戏曲；书名多冠以“新刻出像音注”等；卷端题下多刻有“金陵富春堂梓”之类的标志；多四周花边；多插图。

北京书坊，以汪惊的汪氏书肆为著名。其刻书特点是：都是翻刻或重刻；多半叶十行，白口，单边，双鱼尾；目后多刻牌记或鬻书广告。

通过对比，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建本与杭州、金陵、北京等地坊刻本在刻风上的差异是明显的，因而也就比较易于鉴别。

五、关于建本的评价问题

清朱彝尊曾在其所著《经义述闻》卷二九三中引用过宋朱熹描述建阳刻书的这么一句话：“上自六经，下及训传，行四方者，无远不至。”这句话的意思是：第一，以儒家经典及其加工的著作为刻书的主要内容，符合封建统治的矩矱，使书坊的存在和刻书事业的发展有所保证。第二，销路广。无论何方，也无论如何遥远，凡人迹可至之处，建本也必至。它虽然只字未及刻书质量，但是字里行间已予建本以充分的肯定。

建阳刻书的内容以儒家经典及其加工著作为主，经、史、子、集各部类应有尽有，大体上可以满足社会各阶层的需要，理顺了供求的关系。其中刻印了不少有关劳动生产、社交活动、村塾启蒙、小说戏曲等通俗读物，以满足城乡庶民的文化需求。同时它让白文与训传合二而一，给阅读与收藏带来了方便，赢得了不少读者。

建本的质量，历来都是有毁有誉，毁多于誉。宋叶梦得在他的《石林燕语》里就曾把建本贬得很低，以“最下”目之，并认为建本“多以柔木为之，取其易成速售，故不能工”。陆游《老学庵笔记》所讲的考官丢丑故事，实际上也是在建本《周易》把“乾为金，坤为釜”误为“乾为金，坤为金”的批评。元代，马端临亦颇有微词。明郎瑛《七修类稿》则以“专以货利为计”责之，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也指摘它“纸短窄黧脆，刻又舛讹，品最下而直最廉。”清叶德辉在《清话·宋刻书纸墨之佳》中谈到“近年京师、沪渎偶出一宋季元初麻沙坊刻，动估千金”时，也用“虎贲以代中郎，砭砭可充和璧。时无英雄，竖子成名”批评它。总之早在宋代，建本就已受到非议。其质量之低下，似乎已成定论。

其实，只要客观地、全面地、历史地考察一下建本，就不难发现：其主流是好的，其问题是客观存在的。试想：要是只有数量而没有质量，怎么可能容忍“福建本几遍天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没有质量作为保证，数量怎么可能增长得了，在元刻传本中，建本怎么可能多过杭州坊刻，江西估客怎么可能专程赶到“麻沙村里贩书回”？如果建本是劣质的，南宋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怎么可能给予建本《九经》以“最善”的评价，怎么可能称赞廖刚厘订的重刻本“当时称为精审”，元朝统治者怎么可能于至治二年（1322）把《大元圣政国朝典章》交给建阳书坊刊行，浙江儒学提举杨志行怎么可能于泰定三年（1326）特派张存中把元胡炳文的《四书通》委托建阳余氏书坊刻梓，清叶德辉《书林余话》怎么可能肯定建阳“刘洪慎独斋刻书极夥，其版本校勘之精，亦颇为藏书家所贵重”，日本后水尾天皇怎么可能于元和七年（1621）翻印南宋建本《皇宋事实类苑》赠给公卿及幕僚？据《中国版刻图录》，南宋建本《周易注》“文字较他本多胜处”；元天历三年（1330）建阳广勤书堂刻本《新刊王氏脉

经》“文字较守山阁丛书本颇有胜处”；元统三年（1335）建阳广勤书堂刻本《国朝名臣事略》，清黄丕烈、陈鱣用以校勘旧抄本，“改正讹夺甚多”；明初建本《蜕菴诗》，张元济辑印《四部丛刊》时被选为影印的底本。

廖刚、刘坪、祝穆、熊禾、熊大木、余象斗等直接参与撰著、编辑、校勘工作，就是建本高质量的有力保证。更重要的是，不少家刻、坊刻主人本身就是学者，就是编辑、校勘行家，都曾著书立说，都对建本的高质量产生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宋蔡梦弼著有《杜工部草堂诗笺》、《草堂诗话》，魏仲举编有《韩柳年谱》、《五百家注音辨韩昌黎先生文集》、《五百家注音辨柳先生集》；元刘锦文著有《答策秘诀》；明余邵鱼撰有《列国志传》，余文召编有《西汉志传》、《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余应敖编有《岳王传演义》等。

杭州与日本都曾到建阳招募过刻工，说明了建阳书坊拥有一支人数众多、技艺较高和经验丰富的刻工队伍。这支刻工队伍，也是建本质量的重要保证。

当然像“乾为金，坤为金”这一明摆着的问题，是从具体的建本《周易》中表现出来的，确实不容忽视，更不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它至少表明，建本并非十全十美，不应当为它捧场。坊刻的质量，不如官刻与家刻，这是一般规律。坊刻的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只不过程度不同罢了。

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建本和建阳刻书，在我国书史、刻书史、文化史、学术史、科技史和版本学上的地位，在国内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在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文化、加强中外文化交流所作的贡献是不能低估的。

作者工作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